

序一

各位女士、先生：

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第九次年会就要闭幕了。这次盛会内容非常丰富，非常精彩，是楚文化研究这一重要课题研究现状的最好展示，对于我来说，则是一次最好的学习机会。

这次会议，由主办者划分为三个组，就是“历史、文化、古文字”、“考古新发现”和“器物”，这很好地体现了楚文化研究以考古学为中心的多学科交叉结合的特点。从每个组的论文和发言都有许多创见看来，我们的楚文化研究正在迅速进展，可以说是前途无量。

现代的楚文化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30 年代末的商承祚先生的《长沙古物闻见记》，考古发掘从《长沙发掘报告》算起，迄今不过五十年来，然而楚文化研究的成果，在各种区域文化研究中，无疑处于先进的地位，有关论著论文及相关资料的发表也最多。国际上也有学者专门从事楚文化的研究，1999 年由美国柯鹤立、马绛主编的《释楚》(Constance A. Cook and John S. Major ed., *Defining Chu, Image and Reality in Ancient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一书，便代表了这方面的趋向。

近年有些学者说，中国考古学已处于黄金时代。我认为，如果讲是黄金时代，也只是黄金时代的开始阶段，因为现代意义的中国考古学，从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田野发掘——1926 年的夏县西阴村、1928 年的安阳殷墟算起，至今还没到 80 年，即使上推到甲骨

文的发现,也不过 100 年挂零。这相对于我们中国历史的久远、幅员的广大来说,时间还是太短。楚文化的考古工作和研究更是这样,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甚至还没有接触到,更多更重大的发现也许还在未来。

比如楚文化的渊源问题,不少年前已经提出来了,到现在仍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我是学青铜器的,遇到一些疑难便解决不了。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 M64 是晋穆侯墓,其中出土的楚公逆钟证明楚公逆确是与晋穆侯同时的楚君熊罥,可是钟铭说他接受“赤金九万钧”,制作钟“百□”,这个数字太惊人了。一钧是三十斤,西周的衡制不清楚,但即使比战国的钧小十倍,铜的量也还太大。当时楚地的冶铸工业到底有多大的规模?再有湖南征集的楚公豪戈,由于发现了铭文字体格式一样的曾伯戣戈,真伪已经无人怀疑了。楚公豪即是熊罥之子熊仪,可是这件戈如冯汉骥先生所说,类似蜀戈,而且具有表面处理的圆斑,这说明什么,我们并不知道。

楚文化的传流问题,也很值得思考和讨论。一般说汉承秦制,秦文化对汉代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好多方面看,楚文化在汉初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大家了解,建立汉朝的君臣多系楚人,楚文化的许多因素,在汉朝的早期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方面正有很多需要我们深入探索的地方。

可以断言,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关于楚文化会有一系列新的发现,我们现在就应当对此做好准备。我个人的想法是,我们首先要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一个例子是,在考古学方面要对各有关地区的发现作出综合和总结,建立比较详细的分期编年。比如江陵地区,过去用雨台山等地点的分期作标尺,现在能不能扩大,把有关材料尽可能综合进去。

再有,在古文字学方面要对楚文字作深入的分析考释。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楚文字编》,《诂林》一类的工作也在进行。最好

先把有传世文本可资对照的竹简里的文字,逐一研究,更多地了解楚文字的规律,避免过多从声音通转来推测。

在历史学方面,整理和研究楚国的官制和地理可能是当务之急。邓广铭先生说学历史有四把钥匙,官制、地理即在其内。已经发现的竹简、玺印等等包含了大量材料,着手研究并不太困难,所取得的成果会对将来工作,包括考古方面,有重要的帮助。

我举的例子不一定恰当,但只有在现有条件下做好这一类基础性的工作,我们才能更好地迎接新的重大发现的到来。

楚文化研究已经证明在考古学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来说也是特别重要的。在历史文化研究上,理论和实际总是配合互动的,相信楚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会对考古学、历史学的理论有所贡献,而后者又将进一步引导和带动楚文化研究的前进。

谢谢大家!

李学勤

2005年10月29日

* 此文系楚文化研究会理事长李学勤教授在楚文化研究会第九次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